

从遗址解读巴蜀文化

维舟

提示 考古被证明是重新发现历史、认识历史不可取代的方法。无论是三星堆、汉代金棺，还是泸州宋墓、明末张献忠江口沉银，近年来四川不断出土的这些文物，一再刷新了我们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寻蜀记》的作者萧易历时十余年，一一检视这些遗迹，不仅从微观角度重现了四川失落的历史，实际上也丰富了我们对中华文明自身的理解，因为这更进一步证明：在“大中国”这个框架之下，每一个地方都既具备一定的共性，同时又有自身精彩纷呈的特性，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如果从文明的整体性角度讲，四川是中华文明内部最为内向的地方文化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或许得归结于其特殊的地形：四川盆地足够富饶，能养活上亿人，但与此同时又深处内陆、四面环山，“蜀道难”使得对外交通向来不便，构成了一个封闭自足的独特区域。多年前史学家王笛因此将清代至近代四川的开发历程称之为“跨出封闭的世界”。

可想而知，在此之前的数千年里，跨越群山的交通更艰难的时代，四川更是一个遗世独立的特殊存在。前人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的说法——这意味着，四川比全国任何地方都更自成一体、受外力控制更弱，但与此同时，它仍然在“中国”这个大系统之下，并未真正隔绝。这尤其有助于我们理解四川文化的地方特色，因为这种弱联系下的相对自立状态，使一代代的四川人能有选择地采纳、筛选、回应外部影响，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独具一格的当地文化。

最能体现出这种独特性的，便是1986年三星堆文物的出土。黄金面具、青铜神树、纵目人像……这些前所未见的文物震惊世界，对公众而言是巨大的谜团，而学界对如何解释这一“失落的文明”、重写西南历史，也众说纷纭，甚至有人猜想这是远古外星文明的产物。之所以如此，正如饶宗颐在《西南文化创世纪》中所言，“长期以来，西南的古史活动记载是一片空白，虽有一些

扑朔迷离的神话围绕着，事实等零”。

这也是不必意外的事。历史记载势必以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为重，而四川盆地即便长期承载着全国1/10的人口，但它毕竟是“边缘”。最早记载西南史地的方志《华阳国志》至东晋才问世，即便如此，很多地方性的文化生活仍然多有遗漏。萧易在《寻蜀记》中强调：“可以想象，大汉王朝的每一个郡，每一个县，每一个乡村，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刻，都会有无数故事发生，只是未进入史学家的视野，自然也就鲜为人知了。”

在这方面，考古被证明是重新发现历史、认识历史不可取代的方法。无论是三星堆、汉代金棺，还是泸州宋墓、明末张献忠江口沉银，近年来四川不断出土的这些文物，一再刷新了我们对巴蜀文化的认识。萧易历时十余年，一一检视这些遗迹，不仅从微观角度重现了四川失落的历史，实际上也丰富了我们对中华文明自身的理解，因为这更进一步证明：在“大中国”这个框架之下，每一个地方都既具备一定的共性，同时又有自身精彩纷呈的特性，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考古发现也更清楚地证明了四川历来那种“封闭中的开放性”：三星堆遗址横空出世，自成体系，但它和中原文明一同进入青铜时代，这本身就并非偶然，铜饰牌更使之与遥远的二里头文化

联系起来；作为古蜀王都的金沙遗址罕见地出土大量金器，是当时权力的象征，可说是独一无二的黄金之国，随之出土的象牙、玉器，折射出当时远程贸易的存在；盐源出土的汉代青铜器（尤其是源自印欧文化的双马神图案），则可见早在2000年前，横断山脉的西南就已经接入了丝绸之路。

即便在秦汉设治、汉人不断涌入之后，四川仍然孕育出独特的地方文化。在这方面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当地人如何回应中古时期最大的外来文化输入——佛教。王静芬在《中国石碑》一书中曾提出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南北朝时佛教流行于大江南北，北方出现了大量佛教造像碑，南方却极为罕见，只有四川除外。也就是说，各地在接受佛教时，势必要根据自己的传统资源加以顺应和改造，巴蜀大佛多，还有像千佛崖、大足石刻这样的著名遗迹，这不仅仅是因为本地不缺石料这么简单，更可见中原文化通过栈道向秦岭以南的影响、渗透。

在此基础上，我们或许还可进一步考虑另一个问题：四川在历史上何以能不断在遭受重创乃至毁灭之后又重生？三星堆文明灭绝后，古蜀国复兴；蜀国被秦所灭，但都江堰随即又开创了成都平原的繁华富庶；南宋时四川作为抵抗基地，遭蒙元战争破坏最严重，但在元明时期再兴；哪怕是张献忠屠蜀，湖广填四川不久又再现桑田。这种顽强的重生能力，在中

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公元前278年秦攻破楚国郢都后，两湖一带就沉寂了四五百年之久；甘肃曾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但历代盛衰就大起大落，相当剧烈；陕西也是如此：在唐末长安被废弃之后，繁华就难以再现。在世界历史上，一个古文明被摧毁之后一蹶不振的事，则更是比比皆是。

比较而言，四川的模式倒是与古埃及不无相似之处：同样有着肥沃的土地，足够支撑起大量的人口和文明基础；地理环境也相对封闭，因而便于自守，却很少有对外扩张的冲动；可以在有限交流的基础上采纳外部文化，形成自己的独特性；相对安全的处境也使人相对安逸（所谓“少不入川”），最终往往一再被动地承受来自外部的冲击——不过与此同时，又因其深厚的基底，即便遭受剧烈冲击，还是能一次次很快恢复元气，死而复生。

这可说是四川版的“挑战一回应”模式：每一个独特的文明或地方文化，都需要在面对外部挑战时动态地加以调整适应。这种挑战如果太大，可能带来灭顶之灾，但更关键的则取决于人们如何回应——是否能与外部沟通交流、未雨绸缪地判断趋势、根据自身的条件明智地作出决策，既非顽固抗拒改变，又不至于完全被外力所异化，最终成就独特的自我。事实上，这不仅是四川的经历，也是整个华夏文明的历史教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四川是中国的缩影。

聊书

艺术是文明的命脉



◆《四合院活物记》

或许是因为老北京人的缘故，崔岱远的这本书读起来颇像是北京大爷坐在葡萄架下摇着蒲扇话家常。章节的划分充满了京言京味：院里种的、家里养的、逮着玩的、少不了的。既有着那种久经世故看开一切的老北京人的豁达，又有着一种顽皮的稚趣，那种练达而好奇的眼光，在书中比比皆是：从腰粗抱的椿树枣树，到早晨起来碰一鼻子红的鸡冠花，从笼子里过冬的蝈蝈，到昵称“黄老道”的黑黄花大蝴蝶，老天爷饿不死的老家雀（雀念“巧”音），墙缝里溜来钻去的“蝎拉虎子”——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里除了住家人口外，竟还有着如此多的“活物”，难怪老一辈住惯了院的人，住上了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总觉得冷寂得吓人：活物没了，生气也没了，只剩下死气沉沉的生活。



◆《一把刀，千个字》

王安忆的这部长篇《一把刀，千个字》从清袁枚的《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进入，以一位淮扬名厨非同寻常的成长经历为叙述线索，他生于东北的冰雪之地，记忆却从因避难而被携来上海寄居的亭子间开始。

古人道，礼失求诸野，他启蒙于祖辈扬州乡厨的鲜活广博，蜕变于上海淮扬系大师的口授身传，后来在纽约法拉盛成为私人订制宴席的大厨……就如他精神世界的启蒙源自《红楼梦》《黄历》《易经》一样，不同地域间的舌尖上的美味，其实开阔出另外一番融汇了天地与自然体悟的精妙世界，而时代更迭与反复冲刷席卷下的个人命运与抉择，也呈现了多重视角与评述体系下的民间记忆。

给张爱玲“挑错”

张宪光

张爱玲读书广博，记忆力惊人，可是她说自己的记忆力糟透了。最近读闲书，发现她确实常常引错。

《谈看书》是一篇奇文，将人种学、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中外小说等一千书籍顺手引来，三四万字的长文也不屑于分个层次，也不管读者看不看得懂，跟不跟得上，只管将一支笔使弄得如大海游龙，穿云入水，所到之处，风生水起，波澜横生——掉书袋掉成这样，着实让人惊叹。开篇引《阅微草堂笔记》，确实有“张冠李戴”的地方。至于《喷水老妇》的故事，不是出自“有时候有意无意轻描淡写两句，反而收到含蓄的功效”的《阅微草堂笔记》，而是出自“纤巧单薄”的《聊斋》。纪昀的这本言小说集，一共引了4则，倒有3处不太准确。

引中国的古书如此，引西人著作的情况又怎样呢？《红楼梦》的自序说：“我大概是中了古文的毒，培根的散文最记得这一句：‘简短是隽语的灵魂’，不过认为不限隽语，所以一个字看得有巴头大，能省一个也是好的。”这大概是说她力求简洁，用字能省则省。自序又

说：“以前‘流言’是引一句英文诗Written on the water（水上写的字），是说它不持久，而又希望它像谣言传得一样快。”这里引的两句英文，也有两个小错误。一处是“简短是隽语的灵魂”这句话，并非培根所言，出自《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二场佞臣波洛尼斯语；二是“Written on the water”出自济慈自拟墓志铭，原文是“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 in water”，有人译为“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宋淇。《红楼梦》一时半会没有再版，这自序便也忘了改。至于对于西洋小说的内容，即便是张爱玲曾熟读的一部分，引用或加以说明的时候，也难免出错。

记忆力这么好，为什么会引错呢？自然是仅仅依靠记忆力。张爱玲几乎不买书，写东西需要参考书，到图书馆去借；偶尔买书，用完了，就扔掉了。所以，她的手边仅有一些绝版书，散文引书全凭印象，学术书也常如此。例如《海上花列传》第12回目“背冤家拜烦和事老，装鬼戏催转踏谣娘”，她凭记忆拟出的注释是：“唐朝都中少女

游，联臂歌舞，唱‘长安儿女踏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称‘踏谣娘’。”见《太平广记》，“踏谣娘”典出《教坊记》，张爱玲显然弄错了，后来据宋淇提供的《中文大辞典》的解释改正。她后来说：“‘踏谣娘’典故用得非常贴切。我还在小学图书馆里看到一本当时书页已经泛黄了的，用密圈作标点的《旧小说》，收集笔记小说，包括《山海经》，有一则记长安少女出游，出自《太平广记》不知道是否记错了，但是那两句歌词我一直常常想到。”（1982年2月1日致宋淇信）“长安少女踏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出自沈亚之《异梦录》，见载于《太平广记》。她给苏伟贞的信中曾说，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印象不深往往就不记得。让我感到奇异的是：她为什么会选择记下这些？这种记忆为什么这么顽固而强大，竟然记上40多年不走样？

凭记忆记下来的东西，也许有些地方错了，可是那种选择性常常比原文还要精彩，这是张爱玲的一个特点。

《走！走到楼上去》还有一个例子：“后来在一本英文书上看见同样的譬

喻，作者说：可以把婆罗洲的海剪下来当作明信片寄回家去，因为那蓝色蓝得如此的浓而深——发现自己所说的话早已让人说过了，说得比自己好呢，使人怅然若失，说得不及自己呢，那更伤心了。”文中的那个譬喻很可能出自艾格尼丝·凯斯的《风下之乡》：“清晨，湾里的水一动不动，平坦湛蓝，像明信片上的图画。……分散在海里的蘑菇岛，那么小，那么完美，我似乎可以抓起一个直接寄回家，标注为‘来自婆罗洲的问候’。”赫胥黎在《千面葛瑞丝》中说衣服是个符号，是一个人精神的外显，换了衣服就是更换了灵魂，张爱玲则说“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两相比较，张爱玲似也更胜一筹。

严谨的学问家引文要核对原书，力求准确无误，张爱玲不是学问家，引文凭记忆，也是任性得很。在时间酵母的作用下，封存在记忆坛子里的词语、典故、故事变了形，改了色，多了几分人生的醇厚况味，未尝没有一种铮然的金石声。

撬动历史的技术力量

曲宏

规划理论家、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1934年所作的《技术与文明》，曾弥补过这一空缺，但当时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还没有现在这样发达。芒福德把机器看作文明的延伸，研究的只是机器对文明的影响。此后，此类研究很少，本书将这一研究再次向前推进一步。张笑宇以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为叙述对象，关注的不仅是技术史，也不仅是文明史，而是技术力量如何改变历史的文明进程。叙述风格、思考深度与以色列年轻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历史类著作《人类简史》颇为相似。

《技术与文明》以小见大，从历史长河中筛选出14个最关键的历史时刻，讲述这些时刻背后的细节如何影响了历史走向。譬如，弩如何帮助秦国统一中国？司马南车等早期发明为什么会被遗忘？铁路这种新技术以及19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的绝大多数科技突破与政治制度之间有哪些关系？工业化如何解决过剩人口问题？机枪的发明如何改变战争规则，如何让20世纪的世界重新洗牌？等等，作者通过对技术力量对历史的撬动作用做了深度挖掘。比如，秦献公决定请墨家入秦的目的本是为了守城。因为墨家最擅长守城，也最擅长守城。用弩守城，就涉及人员的动员和组织。正

是从这个意义上，弩带来了军事组织制度的变革。因为弩利用的是机械力量，训练难度远低于弓，原本不擅作战的平民百姓经过短暂训练，也能杀死久经战阵的强壮士兵。这样，动员与训练一支足以与正规军战斗力相抗衡的部队成本就大幅降低。更重要的是，墨家给秦国带去的不仅仅是一套战术，还有一系列制度与思想契机，从而引发了后来的秦国变法。从此平民中的新生力量大量涌现，秦国成为六国中最强大的国家，最终统一天下。

从《技术与文明》中，作者引领我们发现了一条规律：技术可以快速地、大规模地、基础性地改变人类物质世界的底层结构。这本书还启发我们，习以为常的认知不一定合理。比如，技术与制度的关联及顺序并非像过去我们想象的那样，不是先有先进的制度，才有技术的发展，而是技术力量推动和促进了人类组织结构、制度和文明的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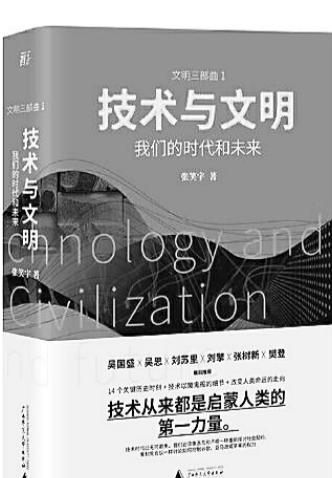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沉睡的历史总是藏着文明的真相。虽然是14个历史时刻，但作者打通了学科边界，他将经济学、机械工程学、社会学、农学、法学、管理学、生态学等知识信手拈来。同时，力求用一条文明进步的脉络将各个历史片段串起来，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技术与文明》不再使用惯常的历史叙述外壳，而是用心采撷能推动文明进程的历史片段，找到关于文明发生发展的简朴、新颖的问题答案，发掘历史外壳下更为鲜活的文明规则。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最早的纽卡门蒸汽机最致命的缺陷是耗煤过多。所以，纽卡门蒸汽机绝大多数在煤矿区运作。它使用的都是被煤矿丢弃的劣质煤炭。英国的煤矿工业在全欧洲是最发达的，1700年前后，英国占到整个欧洲煤炭产量的80%和产值的59%，这样庞大规模的煤炭产业给蒸汽机创造了极好的应用市场。有人持续改良蒸汽机的前提是因为改良蒸汽机是可以赚钱的。而法国的尼尼奥研制的蒸汽机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就是耗煤量过大，法国又没有英国那样庞大的煤矿工业。瓦特发明蒸汽机分离式冷凝器的核心作用就是将纽卡门蒸汽机的耗煤量降低50%，比纽卡门蒸汽机刚发明时降低了80%，这项技术的经济前景十分广阔。英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当时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对较高的。而伦敦地区的工资还要比其他国家高出一截。这是支撑高额煤炭消费量的重要基础。而高工资从伦敦向英国全国蔓

延，这也促使企业更倾向于采取用蒸汽机等替代人力的技术进步，这样可以减少成本支出。蒸汽机的发明过程让我们看到，人均收入水平不仅关乎社会公平，也关乎技术进步。这些不仅仅是历史，更是一种深刻的反思，一种哲学的彻悟。

历史是过去传向未来的回声。“技术如同一道地平线，每增加一分，人类文明的图景就被改变一分。”作者认为，技术作为超越人类自身局限性的工具，可以改变世界。但反过来，人类也可以赋予技术以灵魂。人与机器能够多么像人，而在于人在多大意义上变得像机器，而无力思考更高层面的问题。人类面临的问题还在于，人工智能、自动化制造与大数据分析等一系列技术在技术型制造业迅速压缩了就业者的从业空间：售货员、餐饮服务员、司机等低门槛服务业从业人员未来会被人工智能取代。人与机器的关系，关键不在于机器会变得怎样，而在于人会变得怎样。

《技术与文明》正是通过不同历史事例来理解文明进程的运行本质。它告诉我们最关键的是，在机器人不断智能化的未来，人类的明天将是什么样的，这一切都由人类自己摸索决定。



技术塑造人类社会组织形态的力量，出乎意料地强大。从历史的细节中，可以看到技术力量对人类根本性的塑造能力。张笑宇的《技术与文明》从物种的视角提炼物种规律，以技术为主角，系统阐述玩具、手工业、印刷、枪炮、蒸汽机等十多种技术对历史的影响，观察人类与技术的互动规律，揭示历史上的牢固大厦如何坍塌以及新的道路如何浮现，并探讨了人类如何与技术力量共存的未来话题。

在文明的叙事框架里，过去，人们往往忽略技术力量对上层文明产生的根本性影响。美国城市



◆《艺术与文明》

本书作者范景中是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大家，也是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最早的中文版译者。在范景中看来，艺术是文明的命脉，虽然我们能凭本能感受艺术之美，却要借助历史和风格的框架来真正理解艺术之美。因此，本书在介绍从远古时期到中世纪欧洲的艺术发展史之外，更希望帮助读者建立起观赏艺术的不同视角，从艺术起源的历史背景出发，来思考其诞生、发展的原因。例如借巴黎圣母院分析建筑与音乐的共通之处，所谓“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因为它们都体现了“数的和谐”，美妙的音乐由黄金比例的音阶构成，美妙的建筑则由黄金比例的结构搭建。